

經典 探索系列



赤日炎炎

台灣一八九五—一九四五

經典雜誌社 編著



一八九五年六月五日，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
 在基隆港的前清海關內設立了臨時台灣總督府
 開啓了日本帝國在台的五十年統治
 從乙未割台的誓死守禦到一九三〇年的霧社蜂起
 台灣住民一面抗拒日本化的壓迫
 卻也在變遷中接受了現代化的洗禮
 日本的南進政策創造了台灣的工業契機
 但帝國戰略卻致使島嶼捲入二戰的烽火
 這段殖民歷史最後以日本戰敗而告終
 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，台灣承擔了歷史上的獨特際遇
 歷劫受苦，但卻匯聚出今日美好的一切
 不事人物褒貶，不論政權成敗
 《經典》以太平洋為歷史書寫的框架
 以經濟發展及常民生活變遷為時代座標，爬梳日治台灣史
 唯有寬容地面對，我們才能窺見歷史的全豹

ISBN 986-81419-0-7



9 789868 141902
定價NT:1200元

K 295.8
200624

港台書



赤日炎炎

台灣一八九五—一九四五

弄潮兒應向濤頭立

經典雜誌發行人

王瑞石

歷史擺脫不了時間，時間是歷史的軸線。

歷史擺脫不了觀念，觀念是歷史的方向。

歷史擺脫不了強權，強權決定歷史的興亡。

歷史擺脫不了政爭路線，政爭路線影響歷史的篇章。

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：歷史有時不免屈服於現實，但現實再怎麼樣也改變不了已經發生的事實。儘管事實有時因人爲的現實，而一時隱晦難明，可是事實終究是事實，不因人爲之現實而存廢，也不因解讀之不同而變易。但什麼是真相？何者是事實？最後還是要回歸於人爲的主觀意識和個人的政治現實，所以修史難、編史難、論史難、判史更難。

大家都知道，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；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歷史，歷史就像一個國家的靈魂一樣，靈魂飄散了，國家也就滅亡了。這就是爲什麼「時不分古今，地不分中外」，每個朝代、每個政權都那樣在意歷史的編修和勘正了。

對於台灣的歷史，編撰者多，論證亦眾，但正所謂「路線決定歷史篇章」，儘管學者專家言之諄諄，而政治人物卻說之夸夸，史實雖一，立場各異，事物入眼，各成藍綠。我們說：修史難、編史難、論史難、判史更難，證諸各朝各代，自有其道理存焉。

既然時間是歷史的軸線，對於台灣現代史來說，公元一八九五年，是台灣歷史軸線的一個重大轉折點。因爲甲午戰爭中國戰敗，中日雙方於公元一八九五年，簽訂了馬關條約，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，於是一夕之間台灣易幟了，台灣民眾也從大清子民變成了大日本皇民。面對如此歷史劇變，中國知識分子聞之譁然，而台灣民眾聞訊之後也爲之驚慌。

在中國的歷史上，改朝換代，或許司空見慣，「成者爲王，敗者爲寇」，被視爲情勢的必然，所以老百姓對於改朝換代，往往不動如山。他們始終認爲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？」只要日子能過，生活無憂，何人當家作主，他們即使無奈，也都能淡然接受。

然而這次大清帝國割地賠款，給台灣民眾帶來的不只是一個小小的震撼。當時台灣士紳民眾群情激憤，反對割台聲起，大清帝國既然棄台灣於不顧，台灣朝野只好力圖自救，孤軍奮鬥，並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「台灣民主國」，推舉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為總統，並致電清朝政府，表示「台灣紳民，義不臣倭，願為島國，永戴聖清」。

面對日本軍事強權，「台灣民主國」僅曇花一現。形同烏合之眾的「抗日義軍」，欲用螳螂之臂擋千鈞之車，戰事當然節節敗潰，領軍抗日的將領也紛紛棄守，渡海逃亡內地。當時抗日力量雖然微弱，但誓不做倭民的悲壯行動，確是同仇敵愾，聲振全台。

成立「台灣民主國」是當時台灣朝野的最後一搏，台灣巡撫唐景崧在電奏清廷的電文中說：「萬民誓不服倭，割亦死，拒亦死，寧先死於亂民之手，不願死於倭人手。」又在《就任大總統宣言》中說：「當此無天可吁，無主可依，台灣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。」而在「台灣民主國」《致中外文告》裏更說：「唯台灣土地政令，非他人所能干預，設以干戈從事，台民惟集萬眾禦之。願人人戰死而失台，決不願拱手而讓台。」可見面對「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」，台民「窮無所之，憤無所泄」，有一種被遺棄的強烈孤憤感覺。

清朝末年中法戰爭名將，也是黑旗軍首領劉永福，時任廣東南澳鎮總兵，一八九四年移駐台灣，一八九五年率兵阻日登台無功，被迫棄守，退回廣東時，曾寫下抒發心中鬱抑情懷的《別台灣》詩：

哀生無限托笙簫，淚落清霜化作潮；
飲膽枕戈期異日，磨刀勵志屬今朝。
生存道義何遲死，身是金剛不怕銷；
再奏悲歌驚四座，滿江一曲賦魂消。

而參與議建「台灣民主國」，並被推舉為副總統及全台義軍統領的丘逢甲，也在大勢已去，不得不揮別台灣時，也寫下了《離台詩》。在此同時，他致書妹婿說：「將行矣，草此數章，聊寫積憤。妹倩張君請珍藏之，十年之后，有心人重若拱璧矣。海東遺民草。」遺民的意思就是被遺棄的人民，他的孤憤溢於言表。《離台詩》曰：

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；
扁舟去作鴟夷子，回首河山意黯然。
捲土重來未可知，江山亦要偉人持；
成名豎子知多少，海上誰來建義旗。

又如時任「壯字營」統帶，協助丘逢甲抗日的謝道隆也寫下《割台書感》，詩云：

和約書成走達官，中原王氣已凋殘；
牛皮地割毛難屬，虎尾溪流血未乾。
傍釜游魚愁火熱，驚弓歸鳥怯巢寒；
蒼茫故國施新政，挾策何人上治安。

儘管當時台灣士紳一片「太息淡江花錦地，屍橫遍野哭聲哀」，也儘管「夜深細共荊妻語，青史青山尚未忘」，但台灣割讓日本已成定局，即使「舉國合辭爭割地，疆臣誓死欲回天」，但誠如當時文人蔡國琳所說的：「是非何必千秋定，一局殘棋已了然」，既然無力回天，大家也只好忍氣吞聲默認事實，屈服現實了。

時間是歷史的軸線，甲午戰敗，一八九五年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，從此接受日本統治；一九四五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，台灣脫離了日本統治。就在這五十年，半個世紀中，日本不僅在劉銘傳經營台灣的既有基礎上，對台灣展開了全方位的建設，同時也對台灣人民的思想進行了改造。台灣百姓從當年義憤填膺，誓言「飲膽枕戈期異日，磨刀勵志屬今朝」的悲壯，到皇民化後的逐漸順服，直到現在老一輩還會念念不忘日本治台的豐碩成就。其間台灣民眾態度的轉化，固然有部分屈就於無助的現實，但許多部分確實由於日本據台期間對建設台灣做出的巨大貢獻。

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，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，日治台灣前後五十年。今年是二〇〇五年，距離一九四五年又已六十個年頭了。清朝割台、日本治台的歷史已經漸行漸遠，但台灣孤憤的情節與棄嬰陰影仍然籠罩未除，背對過去，面向未來，我們更應該要知道如何把握現在。在終戰一甲子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六十年之際，我們回顧過往歷歷在目的史實，認知台灣「風中之葉」的處境，在清割台、日治台的擺盪之間，台灣究竟得到了怎樣的盈虧與福禍？我們應該坦然面對。

《經典》雜誌用一種豁然的情懷，對於日本治台的這段史實，做了人證、物證、事證的蒐集和採訪，並以《赤日炎炎》為書名，記載了台灣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變革和翻新，也記錄了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台灣民眾，從抗日到順服的歷程，中間有可歌可泣，拋頭顱、灑熱血為族群的生存空間而戰，有為「民族大義」，志不事倭而爭，但誠如《赤日炎炎》書中所說的：

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間，日本殖民了西太平洋的這一座島嶼，五十年統治期間留下諸多高壓統治的紀錄和全面性現代化的建設，讓島民今日談論起日治五十年，愛恨參半。但無庸置疑的一點，日本統治台灣是為母國的殖民擴張戰略，日本將台灣建設為南進的跳板，向世界誇耀其殖民的能力。

我們姑且不論日本全面建設台灣的動機和心態如何，但在一九三〇年代，由於日本苦心經營與建設，成就了台灣的第一次黃金時代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所以直到現在，仍然有不少人質疑當年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，對台灣來說究竟是禍是福？如果單從物質的建設和經濟的開發而論，或許台灣是因禍得福吧！

《赤日炎炎》全書對日本治台做了全面性的探討和回顧，有史實的回眸，也有台中日關係的檢視；有國際強權的運作，也有兩岸統獨的糾葛，但更多的篇幅是放在日治時代台灣的基礎建設，公共衛生的推動，台灣農業「糖金米銀」的躍進，城市現代化的宏規，台灣工業化的腳步和進程，以及衍化新興的台灣美術等。台灣在強權鬥爭的夾縫中生存本已不易，在生存不易的環境中能屢創經濟發展奇蹟更屬難得，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珍惜和警惕。

陰影隨著太陽移，弄潮兒應向濤頭立，政治家和歷史家都是弄潮兒，不同的是政治家可以興風作浪，而歷史家則必須乘風破浪，不管興風作浪或乘風破浪，政治家必須立在浪濤的尖端遠望，歷史家也應有勇氣站到看清真相的第一線。

我們始終覺得：歷史不是女孩，可以隨意打扮；歷史也不是陶土，可以任意捏塑把玩。政治人物和歷史學家一樣，不能只做學舌的鸚鵡，而應做能思能想、能飛能俯的雄鷹；不能只想做「領航艦」，有時也應充當「破冰船」。現在台灣又面臨另一次的徬徨，台灣的何去何從，大家都應該有主見吧！

《赤日炎炎》出版在即，除了感佩所有編者、撰者的耐力和心力之外，閱讀各稿之餘，心有所感，特為之序。

甲子回眸

經典雜誌總編輯

序

從一九四五迄今整整六十年，剛好是一個甲子，甲子的望文「申意」，可以是一個初始與原點。站在二〇〇五這個新年度，回溯這個島上的一個甲子前的歲月——也就是六十年前的一九四五年，這個甲子回眸應該可視為一個異國政權的結束，卻同時也是另一個新政權的開始。

那個年代是我父母親由日本籍轉成中華民國籍的一年，但身分轉變的同時，在新執政者的蓄意下，屬於那個之前的年代也突然形成一個記憶上的空白。也就是諸如我的外祖父被強迫徵召去南洋當軍伕，終能成為回台的幸運少數，而其同鄉的某某等均埋骨異域，那些原本是人生或是社會國家上的大事，卻也在政權轉變的同時，僅能深埋那一代人的內心；而我的大伯父於少年時被選去日本學習造飛機，原為當時鄉里引以為傲之人生大事，也於那年之後形同一種不易提及的禁忌。當然，從小長輩們也說著「日本時代」如何躲避轟炸，如何跑防空壕，也說著外曾祖父為了多扛一袋米回家，如何被日警痛毆，而我的祖母也曾……。

把時間回溯至一八九五年，是年是清廷因甲午戰爭而被迫割台。首位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——甘為霖(William Campbell)隔年在蘇格蘭地理學會的演講中提到：「無數的中國官吏，基本上都犯了一個毛病，即以為國家是因官吏而存在，而不是官吏為了國家而存在。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已蕩然無存。」這位當時在台灣已服務超過三十年且奉獻卓越的外國牧師，寫下對先前滿清官吏顛預與官僚無能的不滿，而他對台灣的新宗主國——日本，反倒是有些期待。之後，甘為霖於島上更見證了諸如郵局、電信局、報社和法院等機構。他訝異地發現每項建設都與世界潮流同步：「按我對這個島嶼的了解，要是以他們過去的工作態度與速度，這島上目前的各項建設，根本不可能這麼快便完成，而是至少要花上好幾個世紀的時間。」五年後，他再度回到蘇格蘭地理學會做出了上述的分享，肯定了他之前的推測。

當然，甘為霖也觀察到了全台普遍存在的一股反日情緒，但他終結道：「恕我直言，因為有日本的統治，勤勉、聰明和更有效率的

福爾摩沙民眾，才得以看到他們的白麵包上，有機會塗上奶油。」

從屢被清廷形容為「化外之地」的台灣，到李鴻章告訴伊藤博文說：「台灣瘴癘之氣甚重。」在日本治台期間，這個瘴癘之地竟蛻變成一個會下金蛋的鵝，成為一個遂行其大東亞共榮圈的橋頭堡，而被殖民的台灣也因禍得福，在教育、公衛、交通、農業與工業等方面有著突飛的進展。

「為什麼台灣的車輛與人皆靠右走，火車卻靠左走？」「為什麼大部分的台灣家庭進屋都得脫鞋子？」這兩個大哉問，實已經解釋出台灣與日本之間剪不斷的關係，遑論是從台灣的開發到即使是今日的日常生活中。這中間還不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家庭諸如稱父母親為「多桑」、「卡桑」，而六十歲以上的同儕彼此的稱謂仍使用「Aki」代替秋，「Yoshi」之於「芳」等日語稱呼。當然，如果類比到今日，就如同現今年輕一代會使用「Tom」、「Michael」、「Jennifer」等稱呼來表示自己的新潮與文明，或是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中夾雜著英文。但是後者是堂而皇之的，前者卻是有點畏畏縮縮，似乎不能登大雅之堂。

不能登大雅之堂原因是人為的扭曲，一甲子前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了種種原因，開始更改與刪除島嶼上數百萬人的共同記憶。於是日治時代就等同於台灣人英勇抗日的腳本，被強迫地填鴨於四〇、五〇乃至於八〇年代的學子腦裏。於是，這些年代的台灣人，橫移了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的思維，日本似乎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仇人是不能對台灣有所貢獻的。於是台灣已有的基礎工業，輔佐著灌溉系統的農業，已躋身先進國家之林的公共衛生，與普及的教育，均被歸於大有為的國民黨政府治績。但是如此曲解與拙劣地對待歷史，伴隨著高壓的統治，無數曾為日本國民的自家父母長輩，被迫噤聲於兒女口中的「老師說」與「課本說」；於是那半個世紀的歷史就如此地成為冷門學科，幾乎絕跡於主流歷史、教育學者與芸芸學子中。

一個甲子可以是歲月悠悠，但悠悠歲月相同也是一種沉澱，也是一種冷靜。沿續著《經典》創刊號【萬年淬鍊的台灣人】的專題，我們一路由《發現南島》（探索南島語族的起源與分散）、《風中之葉》（十六到十九世紀，外人記載的福爾摩沙）、《島與陸》（四百年來台灣與大陸的互動歷史）的專輯脈絡，有組織與系統地鋪展著這個島嶼的歷史。如今日治時期的台灣當然也成為《經典》責無旁貸的探索重點。在浩瀚史料中，在地方耆老的記憶裏，在學者的專論內；《赤日炎炎：台灣一八九五～一九四五》，是我們另一個尋求遺失的共同記憶，又一段新旅程的開始。

《經典》咸信，「不清楚過去，亦將看不到未來！」

台灣一八九五～一九四五

赤日炎炎

序

弄潮兒應向濤頭立 王端正 002

甲子回眸 王志宏 006

一、日治台灣史

一八九五～一九四五 020

二、龍旗、虎旗與太陽旗

一九四五年的台中日關係 040

三、佈道行醫

日治時期長老教會的活動 064

四、文明的他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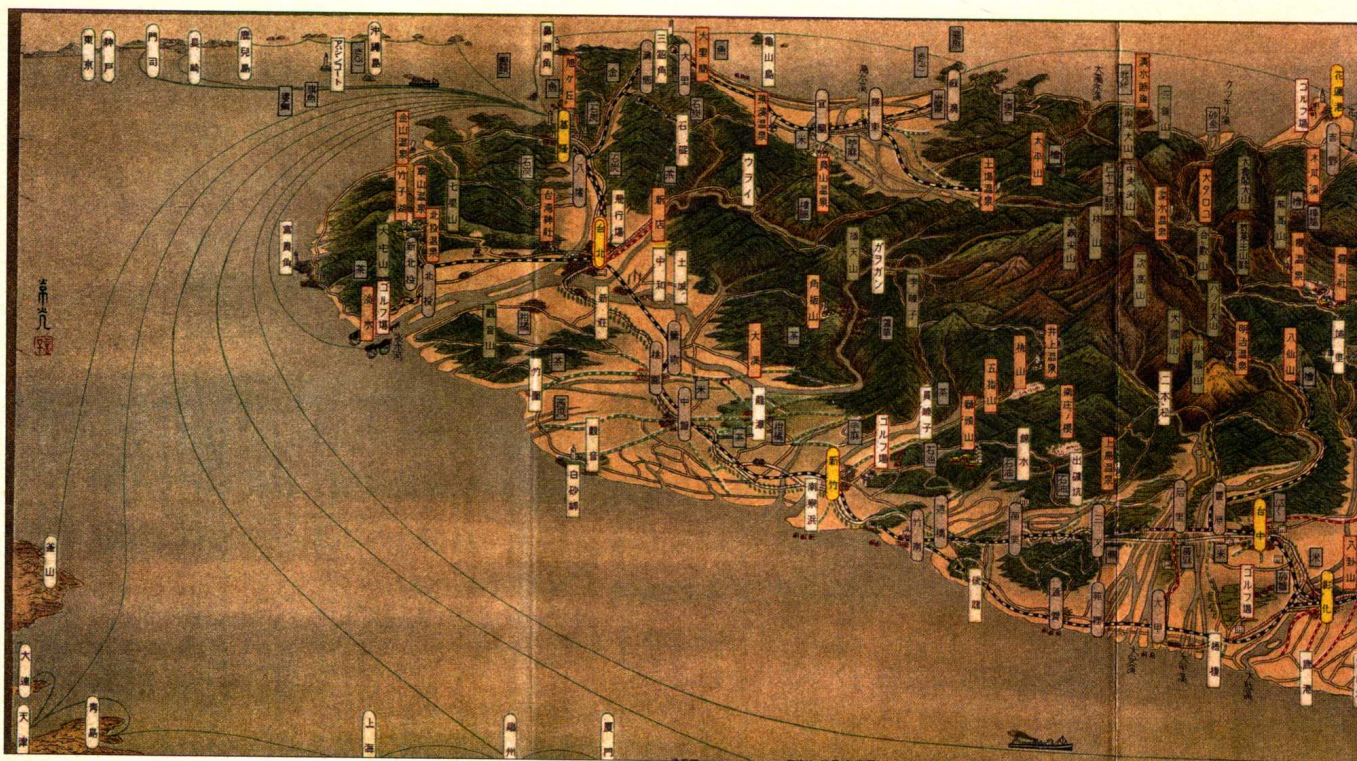
殖民主義下的原住民 072

五、大開拓的雄心

日治初期的基礎建設 096

六、清瘴癘倡衛生

日本殖民的公共醫療成績單 120



七、糖金米銀

日治中期的農業躍進 130

八、市區改正

日治時期城市的現代化 152

九、煙囪與槍砲

日治末期的工業化 162

十、刻畫南國

日治時期新美術運動 186

十一、在歷史夾縫下

日治初期的武裝反抗運動 196

十二、奮起與寂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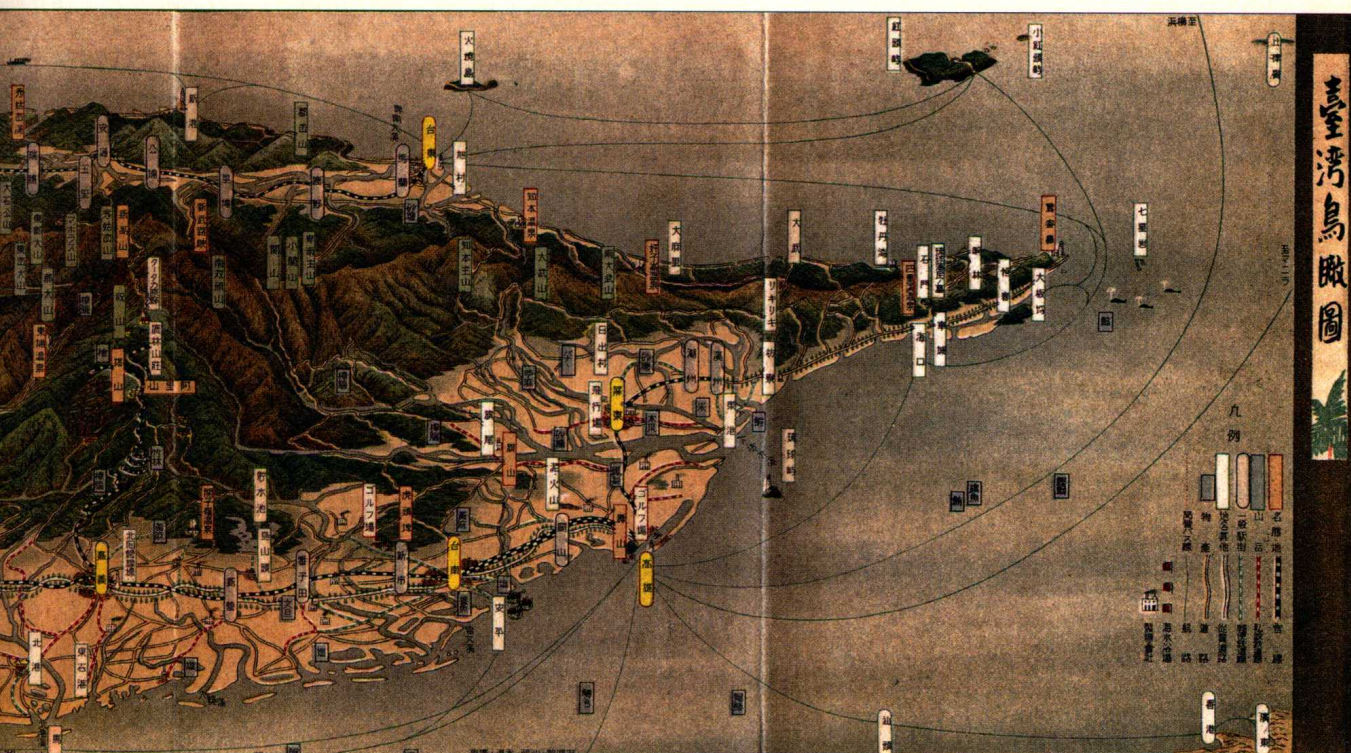
日治中期的社會反抗運動 2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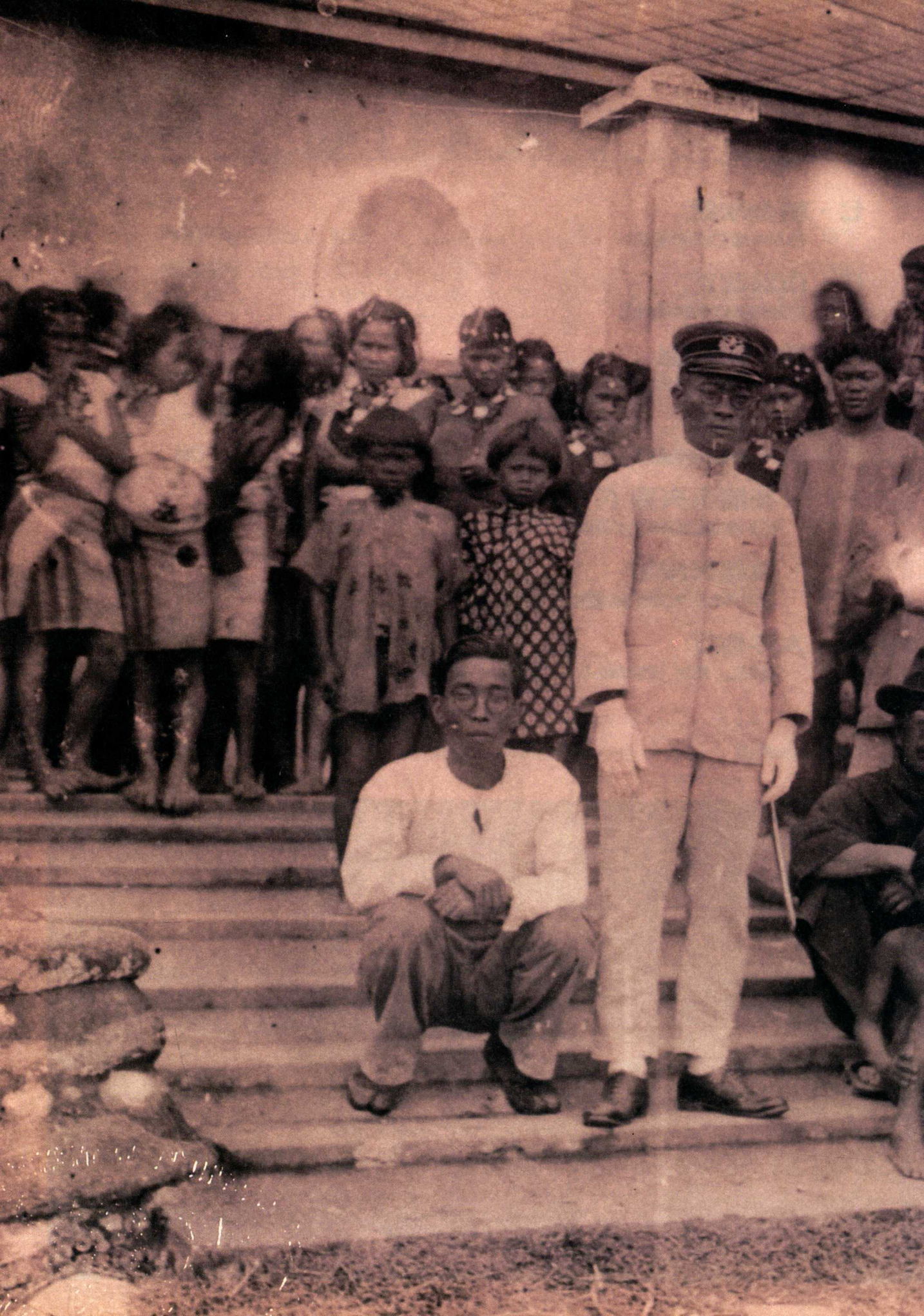
終、大洋彼岸

一九四五，戰火下的異鄉人 228

大事年表 2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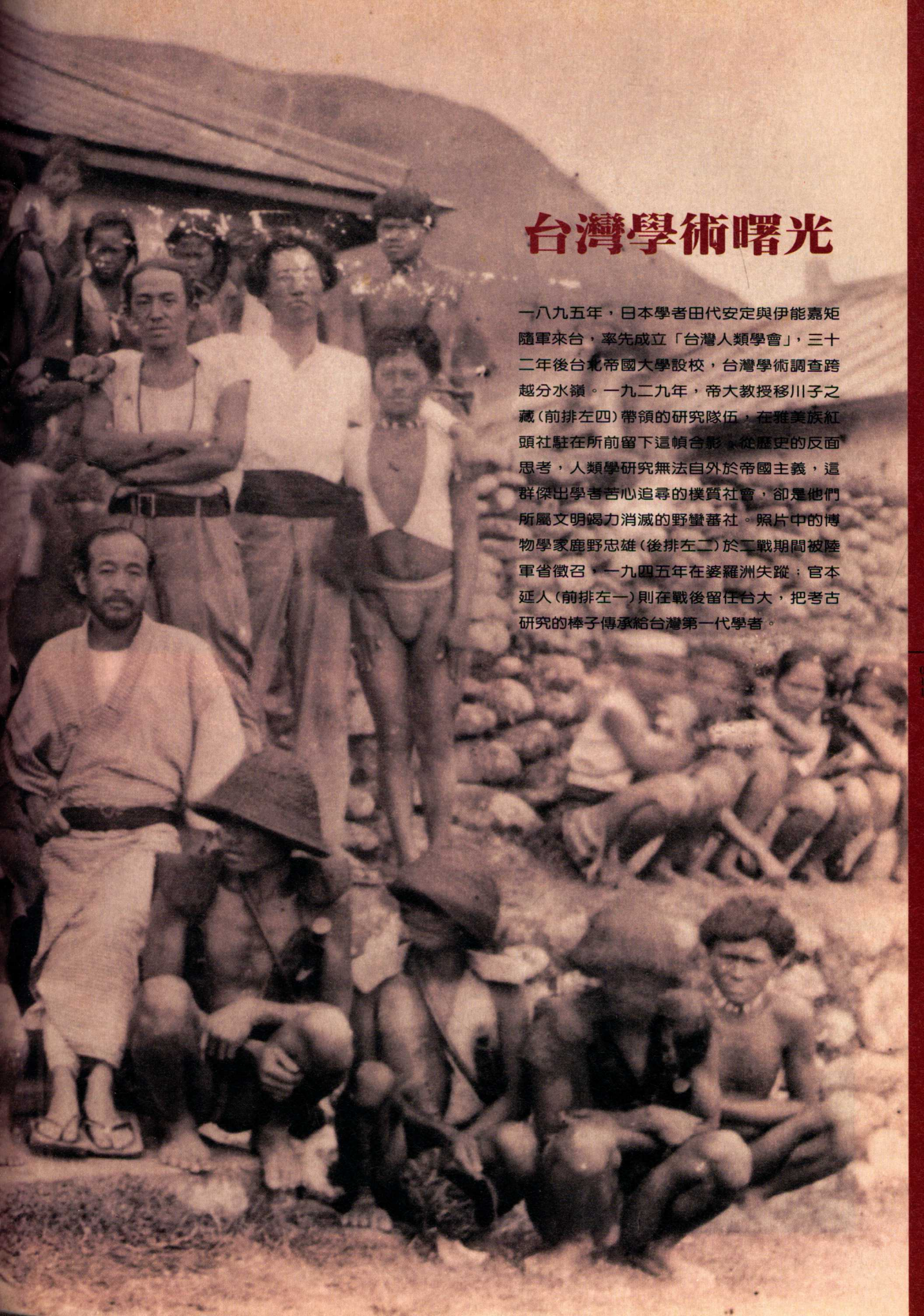
附錄：圖片索引 2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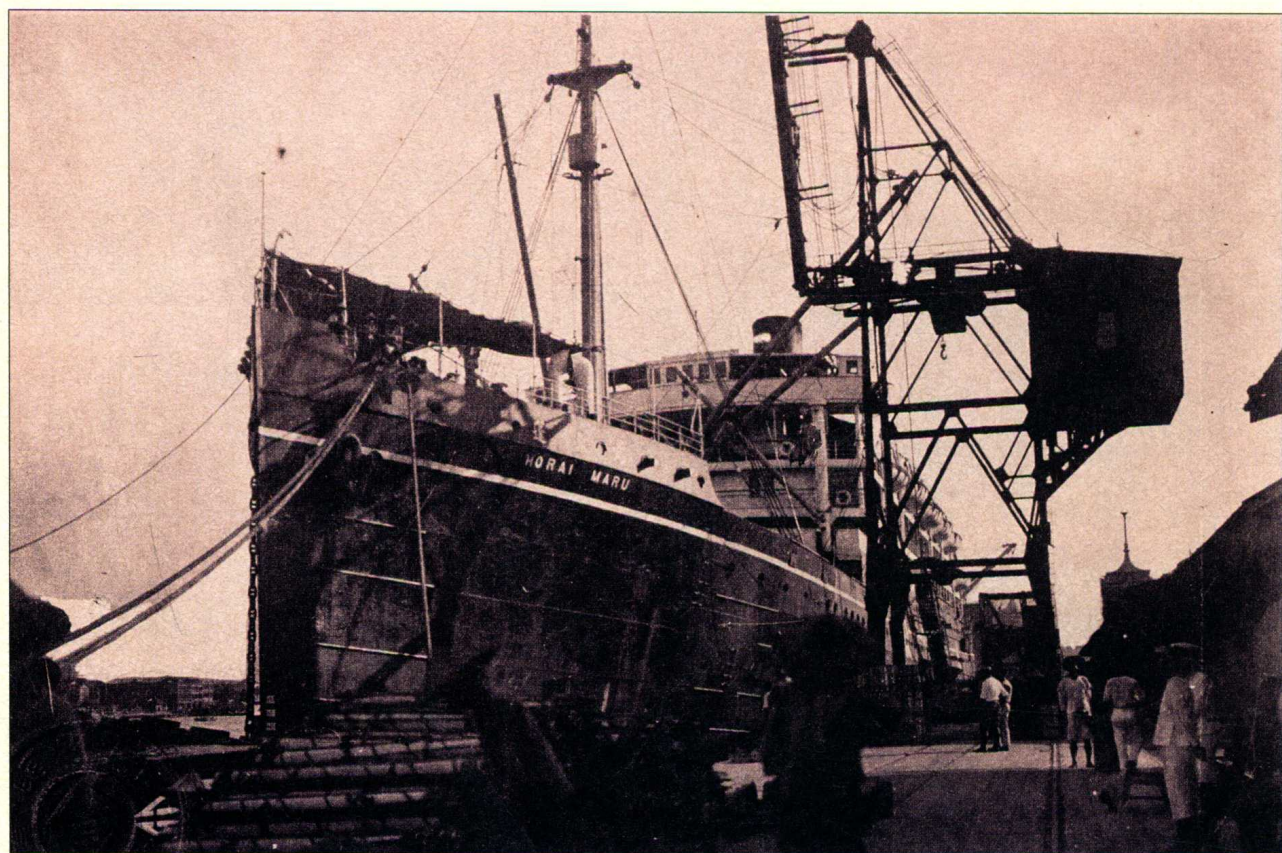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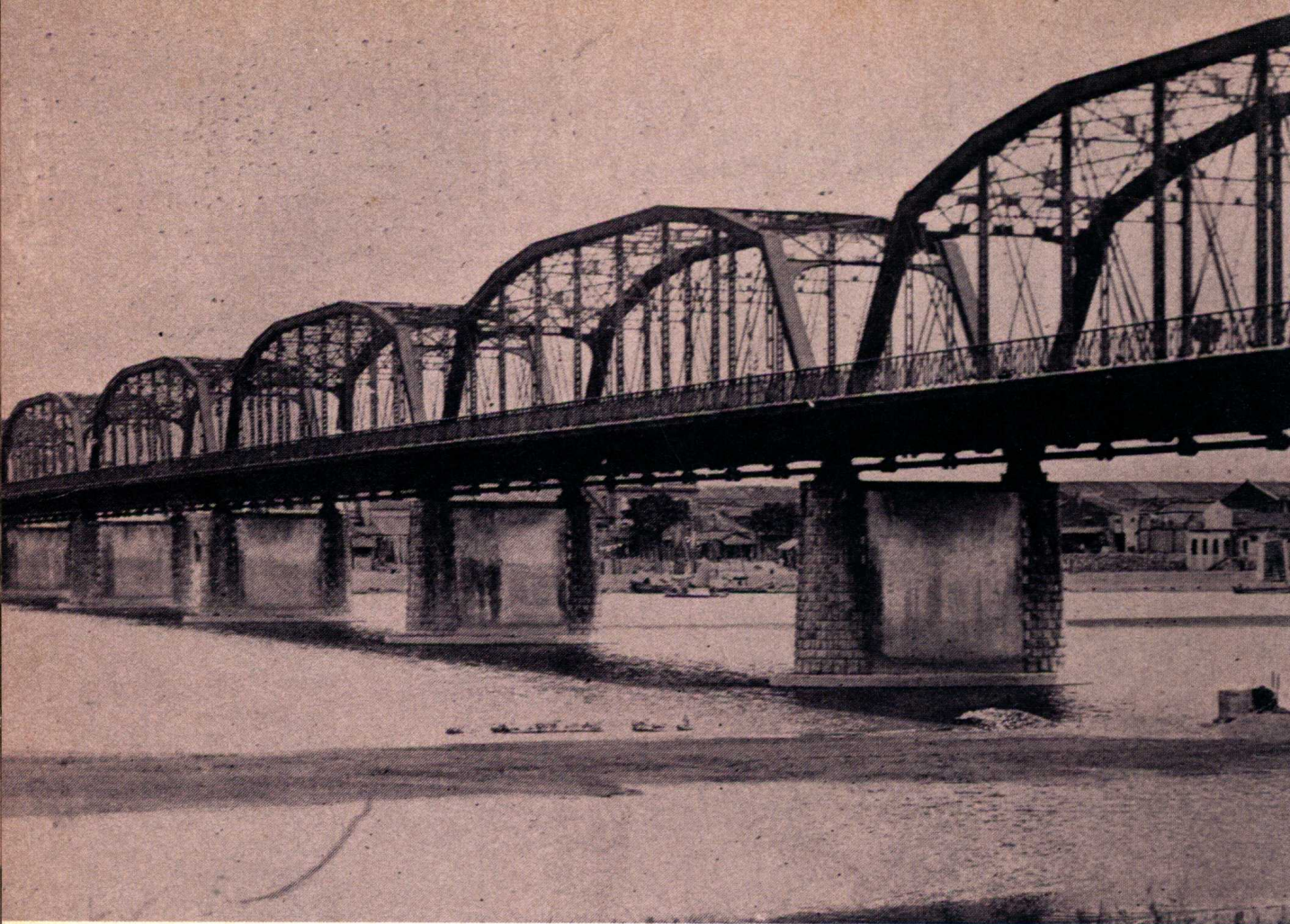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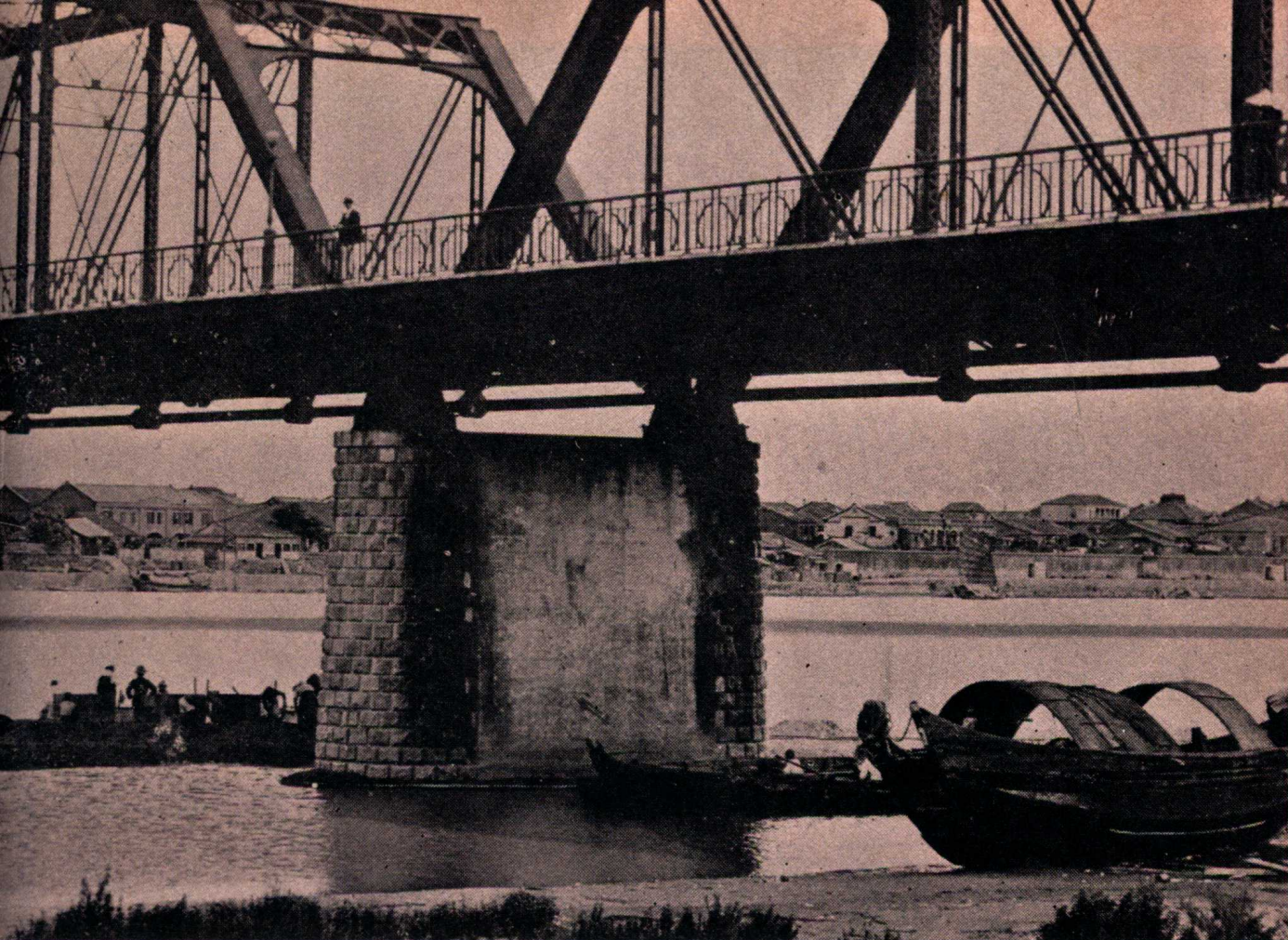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學術曙光

一八九五年，日本學者田代安定與伊能嘉矩隨軍來台，率先成立「台灣人類學會」，三十二年後台北帝國大學設校，台灣學術調查跨越分水嶺。一九二九年，帝大教授移川子之藏（前排左四）帶領的研究隊伍，在雅美族紅頭社駐在所前留下這幀合影。從歷史的反面思考，人類學研究無法自外於帝國主義，這群傑出學者苦心追尋的樸質社會，卻是他們所屬文明竭力消滅的野蠻蕃社。照片中的博物學家鹿野忠雄（後排左二）於二戰期間被陸軍省徵召，一九四五年在婆羅洲失蹤；官本延人（前排左一）則在戰後留任台大，把考古研究的棒子傳承給台灣第一代學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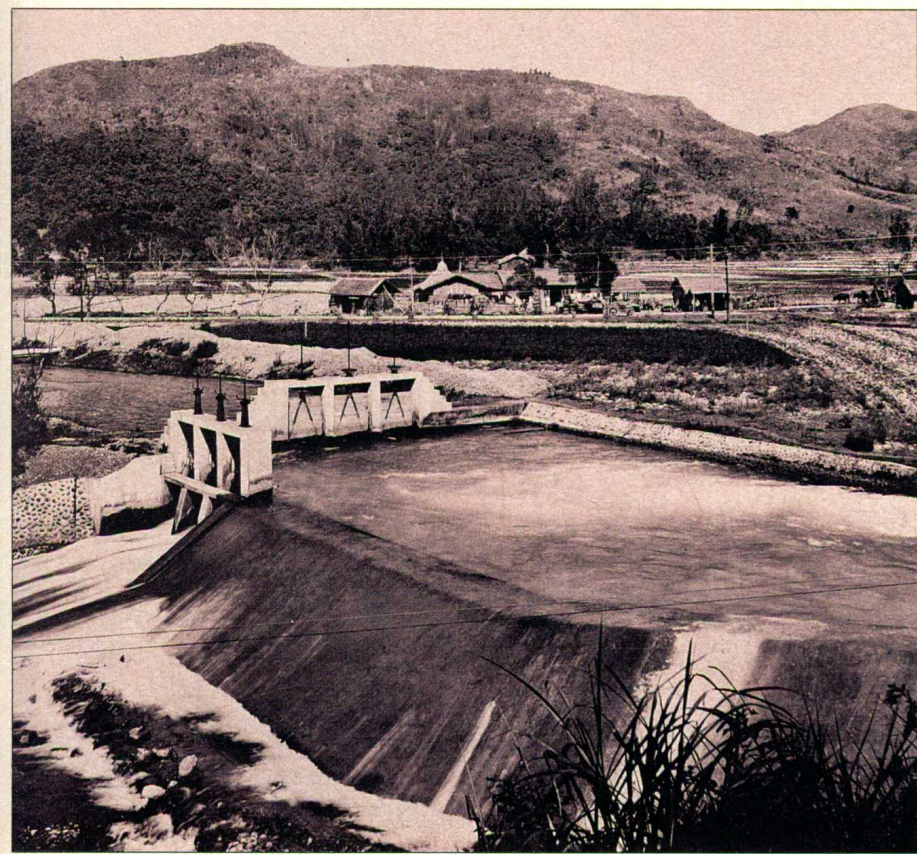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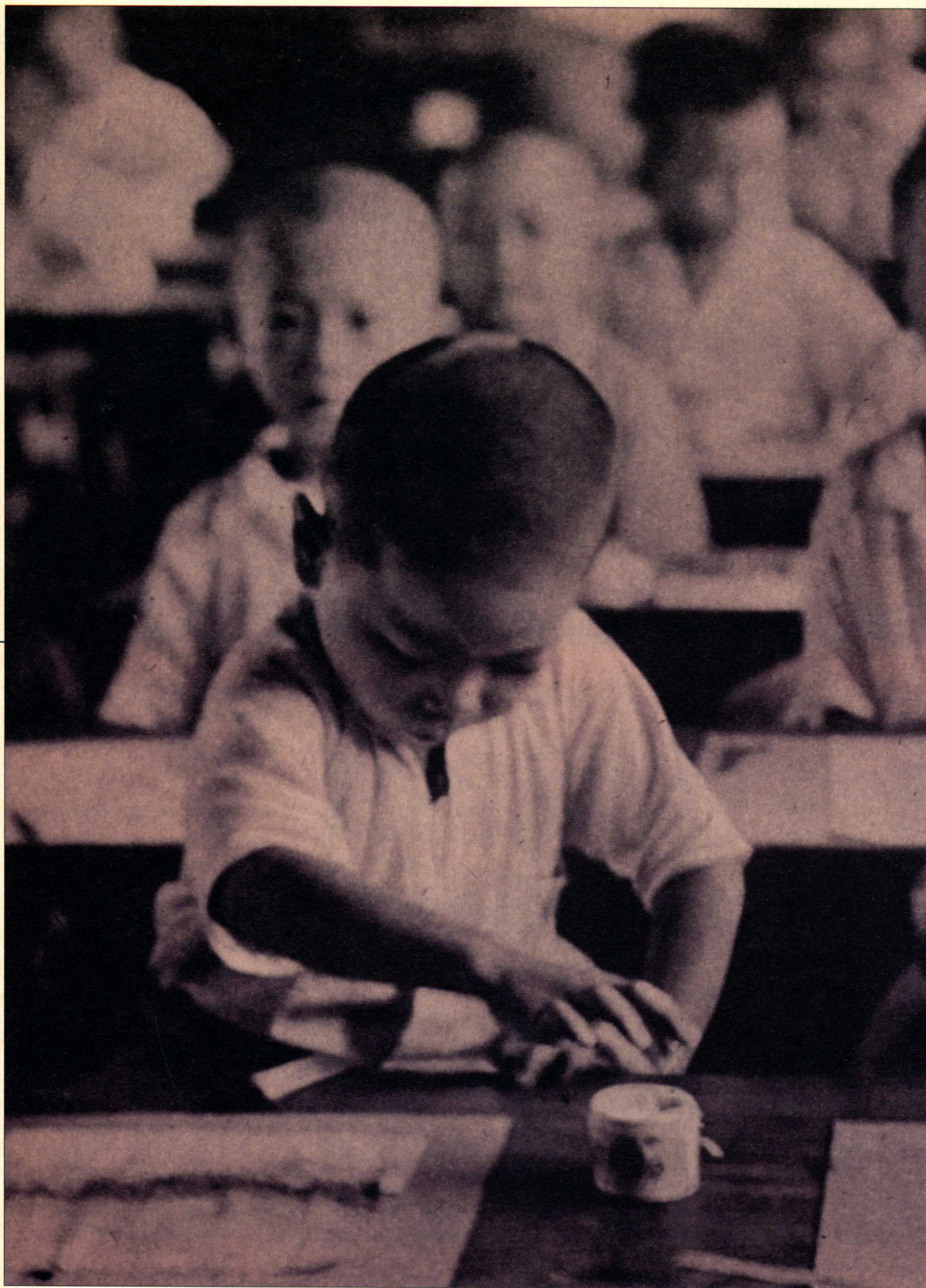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通往現代之路

二十世紀初，台灣總督府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主導下大肆興革。鐵公路交通(上圖，台北橋)將全島聯結為單一經濟圈，水利建設(左圖，獅子頭圳)與品種改良開創了農業躍進，港口整建(左頁下，基隆碼頭)讓寶島與世界互通有無。不論政權功過，日治時期是台灣現代化百年長路中，最關鍵的一段。







教育醫療 百年扎根

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之間，殖民政府銳意推行日本化的教育方式，禁私塾、設學校、廢漢語，到統治末期還實施了義務教育（左圖，公學校的學童）；另一方面，殖民政府也創立新式醫院，強化公共衛生，普及地區醫療（上圖，採血檢查）。這些治績雖有其殖民謀略的考量，卻也同時為台灣衛教扎下深厚根基。